

目錄

《管子》導讀

〇〇一

牧民第一

〇一七

形勢第二

〇三〇

權修第三

〇四四

立政第四

〇六六

乘馬第五

〇八八

七法第六

一一三

版法第七

一三六

幼官第八

一四二

宙合第十一

一七九

八觀第十三 二〇九

法禁第十四 二三三

重令第十五 二四六

法法第十六 二六三

問第二十四 三〇三

侈靡第三十五 三一

輕重甲第八十 三二三

名句索引 三三二

《管子》導讀

趙善軒

現代人對道德價值的追求日趨淡漠，一些家長生兒育女時就已考慮子女他日的回報，某些父母從小就栽培女兒嫁入豪門，許多學生選科以前途作考慮而忽略個人志趣。套用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術語，這些都是「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的考慮，即以事件能帶來利益多寡為衡量標準。反之，傳統文化被視為陳義過高，不切實際，原因是我們從小所接觸的傳統文化乃以正統儒家為主，孔子主張「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孟子堅持生與義有矛盾時，「捨生而取義」（《孟子·告子上》）。這種傾向的傳統價值理性思維，在當下社會重視追求利益的風氣下顯得格格不入。

傳統法家思想把效益最大化視為根本的考慮，這近於工具理性主義，惟法家進一步認為只要能達到目的，不惜採取任何手段，為了國家穩定，可以打壓少數人，甚至草菅人命。《商君書》說：「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威權管治乃基於人民愚昧之設，古今如一，幾乎沒有一個高教育水平的國家，專政機器能夠長期運作。專政者假設百姓無知，故須由「賢人」領導，稱呼上級為領導人，就是設定了人民需要被領導，而無權

參與政治，政府的透明度亦相當低落。《管子》一書載有「賢人」一詞共廿十三次，並屢次提到賢人管治的好處，「賢人政治」(philosopher politics)是傳統中國政治文化的核心底蘊，其另一稱呼是「臣屬文化」，即人民樂於臣服於威權者之下，中國千年來皆行此政治思想，而《管子》對這一理論的建構有着不可或缺貢獻。

近年來，知識界、文藝界仍然不乏人為這種思想重新造勢，試圖製造威權管理的合理性，甚至透過強大的宣傳機器，漸漸成了一種主流聲音。文學、影視作品為這樣的歷史人物塑造偉大的歷史形象，秦始皇、漢武帝不再是杜甫《兵車行》裏的負面人物，而成了一代偉人，清代的雍正皇帝也一改兇殘成性的歷史形象，成了用心良苦的國家領導人，為了社會利益而不計較個人名聲。至於擇善固執又講價值理性的人物，反被人視為不識大體、阻礙社會發展，例如竟有電視劇把岳飛、文天祥說成妨礙民族融合的障礙。這些人往往重視效果，卻輕視手段，譬如不問子女考試的方法，只關心是否能考出好成績；認為工作性質不重要，能養家糊口即可；不在乎官員如何得居大位，只管其施政的成效是否彰顯。這就是大講「發展就是硬道理」的後遺症，一味發展經濟，而忽略了人文關懷才是人類的核心價值，慢慢地由「向前看」變成「向錢看」，從「為人民服務」變成了「為人民幣服務」。

一、主要思想內容

(一) 義利之辨

歷史學家趙靖指出，先秦諸子如管子、孔子、孟子、荀子等人亦認可求利是人類之本性。¹《管子·侈靡篇》更明確提出「上侈下靡」的主張，即富人大量消費以造就貧民、工匠、女工的就業機會，有衣食可得。²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孔子討論的重點是討論「義利」之關係，屬於倫理學層面的闡述。《史記·管晏列傳》亦有相類的記述：「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其實，《管子》既是集各家大成，在義利觀方面比起儒家更有彈性，它不像儒家般視道德價值凌駕於生命之上，動輒講「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或「餓死於首陽山」，而是試圖把傾向價值理性的儒家思想，以及類近於工具理性的法家思想，合而為一，破除非黑即白、二元對立的邏輯謬誤，有意建構成兩

1 趙靖等：《中國經濟思想通史·卷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第六〇〇頁。

2 巫寶三：《管子經濟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一五〇頁。張固也：《管子研究》（山東：齊魯書社，二〇〇六年），第二五一頁。

者並重的思考系統。

許多人以爲管仲既是現實主義者，故此書多是宣揚唯利是圖的思想。事實上，《管子》絕非只講利益，而是認為道德要在滿足基本需要後進一步實現出來。當代哲學家殷海光提出了人生的意義可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物理層、生物邏輯層、生活文化層和價值層。人類需要拾級而上，充實基本需要後升華至道德理想的層次，人生才活得有意義。《管子·牧民篇》也說：「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就是爲「義利觀」建立序列，它既注意實質利益，又看重抽象概念，主張先現實後理想，如此不但較符合人性，更是易知易行，正是提倡在滿足生活文化層後，必須發展道德倫理一層，乃由下而上的道德觀，有別於儒家講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一套。其實，這種思想正是現代人的明燈，人們既渴望生活安穩，又想爲社會出一份力，他們既不喜空談理想，認為過高的目標猶如空中樓閣，但又希望在道德實踐上有一番作為，衣食足而知榮辱似乎是合理的人生目標。順帶一提，法國大革命時西方哲學家孟德斯鳩（*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一六九八—一七五五）也提出相似的說法，世稱「孟德斯鳩命題」，認為當經濟發展起來，擺脫野蠻階段，人們才有能力追求精神上的滿足。³

一言蔽之，《管子》所提出的說法是對人性體察極深的洞見。在道德淪喪，幾乎無所不假的

3 白鷺：《貨殖列傳經濟學》（臺灣：海鵬出版，二〇〇九年），第三十至三十一頁。

社會裏，在路見不平拔足而走的當代社會，較容易引起向來不關注道德的人們的反思，提升現代人的德性。

(二) 經濟思想

《管子》一書所提出的治國思想最為可觀，歷代學人多有引用，尤其體現在經濟方面。中國傳統經濟思想有兩大路徑，一是自由放任主義，以黃老思想為代表，司馬遷的「善者因之」⁴是為佼佼者；二是干預主義，具法家色彩的《管子》就是一大濫觴。趙靖指出，《管子》主張國家對經濟行為進行干涉，此方面可見於《管子》之四民不得雜處說⁵。士農工商的階層說在中國歷史上有極大的影響，日本德川幕府亦以為國策，其實《管子》是這方面的首倡者。對此，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有「士何事」條對此亦有所分析，其謂：

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三代之時，民之秀者乃收之鄉序，升

4 《史記·貨殖列傳》：「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執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5 《漢書·貨殖傳》：「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野，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

之司徒而謂之士。……則謂之士者大抵皆有職之人矣，惡有所謂群萃而州之處，四民各自為鄉之法哉。春秋以後，游士日多。《齊語》言桓公為游士八十人，奉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而戰國之君遂以士為輕重，文者為儒，武者為俠。嗚呼！游士興而先王之法壞矣。

《國語·齊語》亦記載了管仲與桓公的對話：「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言詭，其事易。」《管子》一書與此條史料大抵相合。管仲本人及《管子》一書都反對四民雜處，此乃出於政府管治的考慮，其認為易於控制各階層，以及堵塞社會流動，實大大有利於社會的「超穩定結構」，而國家穩定是其學說的重中之重。

相反，另一路徑是以司馬遷為首的自由主義，其主張「善者因之」，認為市場放任是最好的辦法，反對政府直接干預，此與《管子》提出的輕重理論大相徑庭，輕重論提倡由政府設置機構，監管市場經濟。數十年來，中國奉行干預主義，造成了極嚴重的社會問題；西方諸國大講「新自由主義」，最後令各國債臺高築，引發經濟危機。可見物極必反、過猶不及乃千古不易之道理。西漢初年行黃老之術，然漢興七十餘年後因放任不管，導致富者田連阡陌，貧富懸殊，民不聊生。漢武帝時積極改革，卻因與民爭利而令人民生活無依，此即歷史發展的規律。觀乎歷史，當人心思變以後，又會人心思安，在自由主義下生活得太久，人民又渴望轉向社會

主義；反之，社會主義下的人民又希望在自由主義下生活。南美洲近三十年來，就是不斷遊走在左派與右派之間，政權不斷更替，政局長期不穩，就是不明白中國哲學中不偏不倚的道理。

二、作者及成書

眾所周知，《管子》約成書於戰國中晚期，大部分篇章皆非出於管仲之手，而是後人集體編輯而成。部分內容是後人託管仲之名而作，也有一些章節與管仲其人也沒有直接關係。據陳鼓應的研究，《管子》一書的部分篇章，是戰國晚期齊國稷下學者的作品，與管仲其人的思想並非完全一致，書中內容很大程度上是屬於道家取向，並且主張道法結合，由老莊的理想主義走入現實社會，對後來的黃老思想有深遠影響。⁶

由此觀之，《管子》是先秦諸子的思想集成，是眾多學者共同書寫的百科全書，涉及治國、

6 陳鼓應：《管子四篇詮釋——稷下道家代表作解析》（北京：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九年），第三至二十七頁；參見陳佩君：《先秦道家的心術與主術——以〈老子〉、〈莊子〉、〈管子〉四篇為核心》，第二四五頁。

經濟、軍事、社會、哲學、人口、農業等領域，觸及法、儒、道、農、兵、陰陽諸子學說。

據現有的材料得知，《管子》一書最早被《韓非子·五蠹》提及：「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史記》也有詳細記載，此書可能是司馬遷的手邊讀物。到了晉代，學者傅玄對《管子》的作者提出異議，他說：「管仲之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為，輕重諸篇尤鄙俗。」傅玄對託名篇章的評價不高，認為是鄙俗之作。唐代孔穎達在《左傳·正義》曰此傳大略云：「世有管子書者，或是後人所錄，其言甚詳……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可知作者不是管仲。宋代的葉適《水心集》說：「《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四庫全書總目》說：「今考其文，大抵後人附會多於仲之本書。」當代學者一般認為，書中出現戰國或後代流行的文字，大部分內容非春秋時代的作品，此已成學界共識。⁷

其實，不獨此書，近年出土大量戰國至漢代的竹書、帛書，內容文字與今本流行的大有不同，因我們所讀之版本，多為漢代的改版，多非春秋戰國的原著，故一些學人認為出土文獻使中國哲學史、思想史有改寫的的必要。

今本《管子》與大部分先秦諸子一樣，乃經漢代學者劉向編輯而成。《管子》共八十六篇，

7 張固也：《管子研究》（山東：齊魯書社，二〇〇六年），第二十一至二十二頁。

今本十篇已佚。全書十六萬餘字：《經言》九篇，《外言》八篇，《內言》七篇，《短語》十七篇，《區言》五篇，《雜篇》十篇，《管子解》四篇，《管子輕重》十六篇。《漢書·藝文志》將其作為道家一類，而《隋書·經籍志》則將其改列法家一類。其實，這部書包羅萬有，從不同角度看來，就有不同的看法，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這裏不禁要問，何以後世學者要冒管仲之名而作書呢？主要是因管仲平生乃是實用主義的代表人物，其功業對春秋時代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世人對他高山仰止，故不少學者都藉管仲之名來發揮，希望建立一套實用主義與道德價值俱備的學說。孔子曾說：「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可見就連孔子也肯定了管仲對抗夷狄、使華夏免受夷狄侵害的偉大功績。《論語》中記載了孔子對管仲的人格批評，但孔子也客觀地指出：「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子認同管仲尊王有功，對於維護周室統治權威有着不可磨滅的作用。

司馬遷在《史記·管晏列傳》中說：「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認為世人只讚美鮑叔能識別人才，卻少有人認識到管仲的才能。他還說：「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司馬遷反駁了孔子對管仲的批評，認為他即使有過，也是功大於過。由此可見，對管仲持肯定態度者，乃基於其功業成就，欲以實際作用掩蓋其行事動機，這與西方哲學中的「義務論」凡事以動機作判斷很不同，儒家思想往往以動機作判斷，故近於「義

務論」一類。近百年來，「義務論」被人們視為難以實行的一套，反之「功利論」大行其道，人計算如何將利益最大化，討論社會政策時，目的正義性不再是立論之首要考虑，而成效反是必要條件，這種思維在《管子》一書大量存在。然此書卻非近於個人功利主義，而是以社會利益為終極追求，這比起現代人講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狀況，又是高一層次。

三國時代的諸葛亮也常自比管仲，諸葛亮也是另一現實主義的代表者，史家多將其置於法家人物之中。他為求達到目的，不計較手段，對付李嚴等蜀國本土派毫不手軟，諸葛亮對管仲的推崇，足見其歷史影響。管仲不像大多數諸子般屬文弱書生，而是戰功顯赫的齊國相國，桓公以仲父尊稱他，他也是經世治國的典範，故後世學者藉他的大名來著書立說，實能大大提升作品的說服力。這是古人與今人之別，古人喜託他人之名著書，今人卻有人把別人的作品強冠自己的名字，可見古代著者志在闡述已見，非為沽名釣譽而寫作。

三、管仲其人

管仲（前七二五—前六四五），名夷吾，字仲，謚號「敬」，史稱管子，潁上（今安徽省

穎上縣）人。其祖先是姬姓的後代，與周王室同宗，其父為齊國的大夫，後來家道中衰，至管仲時已很貧困。管仲年輕時曾經商，又曾輔佐齊國公子糾（齊桓公之兄），幾經周折，由鮑叔牙舉薦，得以輔佐齊桓公，封為上卿，最終幫齊桓公建立霸業，被尊為「仲父」，有「春秋第一相」之譽。管仲處身列國並峙、征戰不休的春秋時代，憑着濟世匡時的理想和經天緯地的才能，他從實際出發，重視發展經濟，反對空談，主張改革以富國強兵，使齊國慢慢強大起來。對於管仲的功業，《史記·貨殖列傳》有詳細的記述：

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於威、宣也。

齊國自太公望（姜子牙）立國以來，一直興盛不絕，直至平王東遷後中衰，而令齊國重振雄風的人，不是家學淵源、累世公卿的士大夫，而正是管仲。《史記·管晏列傳》對管仲的成就也作了詳細的說明：

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

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強於諸侯。

職是此故，管仲為相期間致力振興齊國經濟，利用商業的路徑，使得商貨流通不絕。他又對齊國的財政制度進行改革，設立監管機構，大力促進經濟發展，對社會作嚴密監督。如此一來，在勵精圖治下，使國家興旺起來，為齊桓公奠定了春秋霸主的地位。

司馬遷在《史記·管晏列傳》中，轉引了管仲的自白：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為不肖，知我不遇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這段話反映了三點：首先，管仲不屬於「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一類人物，而是現實主義者，因家中有老母照顧而在戰場上退卻，他顯然不是情操高尚的典型人物。其次，管仲也非不事二主的忠臣，他不計較個人名聲，只在乎是否能實現他的治國宏圖，心中只有天下，國家倒是其次。再次，管仲年輕時曾經與好友鮑叔牙一起做生意，可見其與太公望一樣，又是一個商人出

身的政治家，且在他為相期間，致力發展齊國的經濟，最終使齊國稱霸於春秋。

值得注意的是，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典範，大多出身士人世家，或是身家清白的書生，鮮有像管仲有商賈的背景，再憑藉自身的努力而達致社會上流，與他背景相似的有呂不韋（約前二九〇—前二三五）。如此看來，管仲被列為法家人物，實在是基於他的實質功績，因其名聲之大，影響之巨，而奠定了《管子》一書的學術地位。然而，與管仲背景相似，地位相近，影響力相當的呂不韋，不入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管仲與太公望等人卻一同入選，這是因為他們功業顯著而尚有益於人民，非只為個人私利而治國。司馬遷乃繼承了「孔子著春秋，亂臣賊子懼」的傳統，藉史書來品評人物，對管仲其人作了崇高的致敬，同傳的其他人物，也多才德兼備，對社會有很大的貢獻，故古時富貴是兩回事，富者未必貴，貴者須得社會各界肯定。今天，有些暴發戶、官二代、富二代橫行霸道，目中無人，富而不貴，究其原因，就是不懂義利俱重的道理，這大概是沒受過傳統中國文化洗禮所致。

管仲治齊國的經歷，司馬遷在《史記·齊太公世家》又說：

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

《史記》多次引用「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一語，反映了歷史學家司馬遷與《管

子》的作者一樣，認為政府應當先讓老百姓享受物質文明的成果，進而追求精神文明的發展，最後得以「利民」。⁸這可說是現實主義與道德價值結合的一大嘗試，當為過分追求利益而忽略道德的今人所注意。

《史記》中尚有不少對管仲的溢美之詞，《史記·管晏列傳》中說：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

司馬遷認為管仲是「世所謂賢臣」，這一點是對他的功業作出肯定，尤其是管仲對齊國經濟發展所作的貢獻。他又在《史記·平準書》中說：「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強君。」其實，歷史上真正的盛世，經濟發達，物阜民豐是必要的條件。然而，管仲治下的齊國不但國力強大，更重要的是以國力優勢來維護國際秩序與社會正義，帶領盟國維護周室的統治地位，又不與喪德敗行之國為

8 周俊敏：《管子經濟思想倫理研究》，（湖南：嶽麓書社，二〇〇三年），第八十七頁。

伍，也絕不欺壓無辜者而換來國家穩定，這樣的盛世才能令人心悅誠服。反之，一味以軍事力量 and 經濟力量自詡的君主，如漢武帝、唐玄宗、清高宗等，免不了會遭史家批判。借古鑒今，本是賢明者應當效法。反之，一再重複歷史的教訓，受苦的永遠是平民百姓。

四、歷代研究

《管子》研究方面，自唐代尹知章注《管子》至今，至少有四十多種注本，其中尤以石一參的《管子今詮》（上、下），許維遙、聞一多、郭沫若的《管子集校》，馬非白的《管子輕重篇新詮》影響最深。「安徽省管子研究會」集合了數十位專家，多年來累計發表論文數百篇，數量甚豐。《管子》的哲學研究，臺灣學者陳鼓應及其學生有專書及博士論文討論。至於經濟思想研究，香港學者宋鈞五有開拓性的貢獻，大陸學者趙靖、石世琦等人的研究成果備受學界肯定。

總之，《管子》一書內容博雜，以治國及經濟思想尤為重要，故本書選材以此類為主，選取可讀性高且具現代意義的篇章，加以注釋、翻譯和評點，供讀者參考。譯注以李山所注版本為底本，並作了過百筆修改。書中若仍有疏漏及錯謬之處，請讀者批評指正。

牧民第一

本篇導讀——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管子》）書中稱經言者九篇，稱外言者八篇，稱內言者九篇，稱短語者十九篇，稱區言者五篇，稱雜篇者十一篇，稱管子解者五篇，稱管子輕重者十九篇。其中經言九篇，《牧民》為綱領性篇章，是全書首章。牧民即治理國民，本篇闡述治國治民的理論原則，分為「國頌」、「四維」、「四順」、「士經」、「六親五法」五節。

第一節「國頌」開宗明義地點出道德的基礎乃在於生活，而國家強大的基礎又在於道德，其實二者本是互為因果，若只側重一者，斷不可能成就大業。

第二節強調四維的重要性，道德的內涵主要在於四維，一旦四維傾覆，國家也不能有效管治，注釋尤為發人深省，歷代不少帝王或是亡於私德有虧，以失人心；或是亡於國民道德不興，互相侵害。

第三節探討了民心對於治國的重要性，作者論述了為政必須順應民心的原則和經驗，並且具體說明百姓的「四欲」和「四惡」，統治者要想長久穩定地統治國家，必須順應民心，千方百計為百姓謀利，正所謂「水可載舟，亦可覆舟」。

第四節「士經」當為「十一經」，闡述了治國馭民所需要的十一項經常性措施，並具體論述了這些措施的主要內容以及功效，涉及政治、經濟、刑法等各方面。

第五節「六親五法」說明君主治國的一系列具體準則，在內容上首尾貫穿，認為君主治國需要廣開言路，開誠佈公。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¹，守在倉廩²。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³；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⁴，四維張則君令行⁵。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⁶；守國之度在飾四維⁷；順民之經在明鬼神⁸，祇山川，敬宗廟，恭祖舊。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管⁹，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¹⁰，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¹¹，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右「國頌」¹²。

注釋

- 1 四時：四季，指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個季節的農事。
- 2 倉廩（粵：凜；普：廪）：糧倉米廩，即倉庫，古時穀藏曰倉，米藏曰廩。
- 3 辟：開闢。舉：盡，全。尹知章云：「舉，盡也。言地盡闢，則人留而安居處也。」
- 4 上服度：指君主的服飾及用度合乎法度。六親：父、母、兄、弟、妻、子。
- 5 四維：禮、義、廉、恥。
- 6 省刑：減少刑法。文巧：奇技淫巧，指奢侈品的生產、製造。
- 7 飾：通「飭」，整飭，整頓。
- 8 順民：訓民，教化百姓。訓民之經言教化其民之道。明鬼神：尊敬鬼神。
- 9 菅：當作「荒」，荒唐怠惰。
- 10 璋：當作「障」，堵塞。兩原：指上文「民妄」和「民淫」二者的根源是「上無量」與「文巧不禁」。
- 11 校：音「較」，抗拒，冒犯，忤逆。上校即抗上。
- 12 國頌：國家的根本法條。頌，本為一種詩體，此處猶如說「格言」。